

经济边·问题丛

张国钧／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经济边·问题从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F0/547

2007

经济边·问题从

张国钧/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边·问题丛/张国钧著.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620 - 3184 - 0

I. 经... II. 张... III. 经济学 - 研究 IV. F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548 号

书 名 经济边·问题丛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z5620@263. net

[http://www. cuplpress. com](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325 (发行部) 58908285 (总编室)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880 × 1230 32 开本 9. 125 印张 195 千字

版 本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20 - 3184 - 0/D · 3144

定 价 24. 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本社发行科负责退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我关注的“中国问题丛”

(代序)

问题，在实践意义上，不仅左右着个人的命运，更以错综复杂而棘手的形态，覆盖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社会之生存发展的关键、方向、前景；根本性问题更是如此。而诸多问题解决得如何，则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性质和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前途、决定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命运；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更是如此。

问题，在理论意义上，被认为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创造性科学研究的起点，新发现新发明、新理论新学科的生长点。因为，科学研究的天职就在于做出新发现新发明，建立新理论新学科，即“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设有人以相当的勤奋和准备自己进行思考可是产生错误，另有人则抱持真确的意见可是只为免使自己思考，在这两种情

况下,真理所得于前者的比所得于后者的要多”。^[1]正是那些复杂莫辨、棘手难解而又魅力无穷的问题及其所预示的新方向和新领域,启发科学家的灵感,激发科学家打破自在状态,从问题开始而进入互动,提出各种竞争性的理论,并从不同学科的平台上来整合那些经过批判和选择的理论成果,从而超越原有的理论或学科的范围,提出新理论、建立新学科。而问题是无边界、无止境的,问题延伸到哪儿,思想和研究就追踪到哪儿,从而在更开阔的领域里、更高深的层次上去发现并解决新问题,就如同大树那发达的根系不断地发育而培育新的生长点一样(比较之下,学科常常是有边界的;在学科边界内,认识稍一清楚,研究就告一段落,所以多是常规性总结,而难有革命性突破)——任何新理论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任何体系化的科学知识的增长都是“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2]因而,解决问题固然重要,提出问题则更重要、更有革命性意义。一句话,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即从古代的整体化,经近代的专业化,发展到当代的整体化而以问题为中心、突破学科界限,日益成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大趋势。传统的学科范式是“学科中心”,严格界定研究范围、学术框架,不同的学科及其

[1] [英]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35 页。

[2] [英] 卡尔·波普尔:《知识:主观对客观》,载 [英] 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 页。

从业者严守本学科的范围和规范去进行知识再生产；所有的学科及其从业者共同追求体系化的理论和学科，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虽然也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但不是主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尤其是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重大的前沿性突破、原创性成果的产生，大多是从问题开始、以问题为中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近百年以来近半数的诺贝尔奖授予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多学科交叉融合成为优势学科的发展点、新兴学科的生长点、重大创新的突破点，以及人才培养的制高点。文理渗透、理工融合日益成为高层次、复合型、创造性拔尖人才成长的有效途径，世界一流大学均高度重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展科学研究的新领域，追求原创性突破。重要的不再是体系，而是发现问题的眼力、面对问题的胆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预见和捕捉更深层次新问题的智慧。黑格尔式的体系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是主流。

在此趋势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发育着“问题中心”的新的学科范式。在长期的专业化分化之后，经初步的交叉、融合，跨学科、杂交化、整体化的研究和发现成为大趋势。面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各相关学科从不同的层面、视角展开交流与合作，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同一问题展开全覆盖、纵深化的研究。于是，学科生态上，传统的学科界限在淡化；边缘的、交叉的、渗透性的领域迅速扩展。理论形态上，新的学科分支、理论流派、研究方法不断涌现，知识产生途径、理论应用方式都在更新，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对相关的前沿问题的了解。致思取向上，实践性、应用性、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既承传着客观性、规范性等

传统，更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解决各国各地区乃至全人类的一系列复杂性关键性前沿性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己任。^{〔1〕}

问题，是转型中国的历史命脉、前途命运之所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生长点；从问题出发、问题中心，比从学科出发、学科中心，更有利于转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些越来越成为共识。

转型中国面对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一方面，因悠久的传统、广阔的幅员、巨大的地区分化阶层差异、迅速的全球化进程等因素而被放大，从而显得异常难解；另一方面，在被压缩的时段中，又必须尽快地、彻底地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转型的得失甚至成败。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或成熟的经验，也没有可供移植的范例；不能固守中国传统（这经过百年来的激烈批判已不再是问题），更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因为西方模式由以发育的各种因素，诸如始于古希腊、经中世纪以来不断发育的海洋国家、移民社会甚至殖民社会、海外贸易、城市自治、法治传统、个人主义、基督教信仰，中国几乎一个也没有；中国传统中富于解释力、生命力的诸多因子同上述因素相比是迥然不同的。面对中国的问题，西方模式几乎不能解释，更何谈解决？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很难合理地解释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其企业理论也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的家族企业及其蓬勃发展。

不可忽视，百年来，中华传统包括学统、法统、道统均被

〔1〕 陈振明：《政治学前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22页。

西学瓜分豆剖，导致了一系列恶果。仅以中华学统的命运为例，基本取向上，强行纳入西方化、教科书式的体系，嵌入物化、工具化、功利化、技术化等取向，用西方话语解答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仿佛离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越远甚至把问题弄得越“玄”，就越有价值。舍中求外、舍近求远、舍常求怪等做法竟在学界和相当一部分学人中成为“时髦”，陷入西方化的文化专制、绝对主义、权威主义之中。乃至当今中国学界在相当程度上“集体失语”，除了用西方话语。甚至反对西化者，也只能用西方的理论方法甚至案例来面对中国的问题。曾几何时，经济政治生活中，“兴那些越穷越革命的歪理……跟着‘口号’走，伤了群众的利益，失了自己的志气”，^{〔1〕}此风虽然在消退，但至今在精神领域、学术研究中，口号、标签等依然时髦。

学科生态上，中华学统“尚合”，主张文史哲不分家、学人乃通儒，面对问题以整体化思维追求全方位的、根本的、圆满的解答（不取消问题更不“和稀泥”），和西方学术的“重分”、学科细分、“学者乃专家”相比，各有千秋。20世纪以来这个悠久的传统被割裂，中华学统被拉向西方化的重分、细分、专家之途，^{〔2〕}整体上被代之以专业化、分门别类甚至壁垒森严的学科群，偏重于概念（范畴）、逻辑、体系、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体系化成为学科建设的目的，甚至为体系而体系，陷入相对狭窄的学科意识和经院作风。学科内部，以标准化教科书规

〔1〕 阎维深：《不忘人民哺育情，甘将余热献故土》，载《老干部工作通讯》1991年第10期。

〔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

定规范化、一致性、排他性的知识体系，同一学科中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在理论表达、篇章结构等方面都相似甚至雷同；以标准化教科书规定标准化答案作标准来选拔和培养人才，甚至覆盖到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一个学科如果没有教科书，就被认为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标准化下面，有的学科对其基本范畴竟长期缺乏起码的共识（比如伦理学界对“伦理”、“道德”这两个范畴的理解和应用），而真实的社会生活作为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前提却缺乏起码的重视。我们面临着方向性、战略性问题。

“反者道之动”。以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统一中，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学统、法统、道统），回应世界性潮流；从本真、本来、寻根究底的意义上，明澈、清晰、彻底地把握我们面对的关键性、前沿性问题（而不是图解政策甚至口号，不是围着假问题争论不休），通过实事求是、认真细致、深入透彻的研究，从中寻求基元、达成共识。这对祛除汉语失语症、西语症，解答复杂难解的中国问题，不失为较好的选择，并可望由此开拓生机勃勃、前景广阔的发展方向。而当务之急之一是，以“中国问题意识”重新审视经济社会生活中那些久成定论却曲是为非、积非成是、似是而非并陈陈相因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以及或新至妥协的、或持续争议的思想、理念和制度。而一旦打破汉语失语症、西语症，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去反思和善待我们的传统，就会发现：中华文明包括中华学统，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思想、理念和制度上都有一系列弥足珍贵的价值，虽然百年来一直被忽略、歪曲、扫荡。

比如，总体上，中华文明曾长期被以全称判断等同于“封建主义”、皇权专制、压抑个性等，此实乃贴标签的做法。照此逻辑，历史发展上，中华文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历经殷周之际、春秋战国、近代以来等巨变，自秦统一二千二百多年来约一千八百年长期统一、七百年汉唐盛世、宋明清长期统一，18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世界整整16个世纪，怎么解释？文化生态上，中国没有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但有伟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不讲焦点透视、黄金分割，但有璀璨的艺术瑰宝；没有上帝，但有发达的伦理道德传统、内向超越的传统，凡此都和西方文化遥遥相对而相得益彰，怎么解释？思想上，历经周公制礼作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孔子述六经创儒家、汉唐以来应对佛教挑战而催生宋明理学、明清应对西方传教士挑战而孕育明清思潮等思想文化剧变而更趋深远，怎么解释，又何以解释？

再如，家庭（族）和家庭（族）经济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百年来似乎一直是成问题的。如果看看，百年前在家族基础上生成的有近现代色彩的大商帮，如晋商，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建立起强大的商业集团并发展为金融集团，将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并扩张到俄罗斯、伊朗等国；最早创办中国的票号，执国内金融之牛耳并发展到日本、朝鲜，时称“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从商业、金融上支持中央政府巩固东北、华北、西北边疆并奠定中国版图；驰骋上万里、称雄五百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6页。

年。如徽商，以鲜明的宗族血缘特点、同一宗族世代聚居的地缘特点，明中叶以后从早期的散商发展为庞大的地域性商帮，从江南扩展到长江流域、西北、辽东；持续六百余年，称雄近三百年；和晋商分庭抗礼又遥相呼应。其中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如果看看，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户经济复兴、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后举家流动、家族企业崛起，其中家庭农场是农户的自我提升，“公司+农户”是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适应市场向农户的适应，家族企业则是家族在自我回归中自我更新并有效地避免了城市化的诸多严重问题。联系华商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家庭回归”随网络技术大规模进入家庭而在全世界出现，并进行综合性思考，其中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家庭（族）和家庭（族）经济在现代社会究竟有没有生命力？

又如，按照我国民事领域移自西方的规则和做法，“讨债公司”这一类民间私力救济的团体全是非法的，充其量只是介于合法与非法间的“灰色组织”。实际上，这一类规则和做法无论在主体、适用范围、救济限度等方面均因有悖于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民族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等，而无法实行。因为，民间私力救济在中国源远流长，和现实有契合点，尤其是由于诚信缺位（包括政府诚信缺位）的现状，依然是民间自生自发地“自我救赎”的较佳方案，有较强的生命力。“讨债公司”一类团体完全可以经改造而纳入私力救济的制度框架内，形成承传中华民族传统、符合民族心理、确有成效的法律规则和做法。

.....

类似情况不胜枚举。且不论时代潮流和学科趋势，单以如此状况加之多元化背景，想建学科、出体系无异于沙滩上盖楼。

打个比方说，不通过确立基点的“哥白尼时代”、以实验达成共识的“伽利略时代”，就不可能进入体系化的“牛顿时代”；而目前只能是“哥白尼时代”。从问题出发，是建设性途径之一。

基于个人的志业、学术理论追求、知识结构，我力图强化“中国问题意识”来解答我所关注的前沿性问题。经济作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之一，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之一，自然是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我的关注方式是，从伦理—经济—法律的边缘带或交叉点切入，聚焦于自己有感有悟有思的问题丛，作一些探讨。

我力图从社会需要、人人关心、亟待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寻找生长点；力图从本土的伟大实践来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生死攸关的基元性“中国问题”及其解答，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统一来把握中华民族所独具而又恒久普适的基元性智慧的因子及其嬗变，从中寻找生长点。力图随着由此展开的研究的深入、问题的解答，自然生出有意义的见解，以求更好地解答问题。运思、致思的取向是解答问题，而不是完善理论更不求体系。

我的探索，大致渐进地经历了如下三步：

第一，明确本土—原点—原创性的问题域。问题是不胜枚举的；我的学识、能力都有限，只有通过限制广度，才能瞩目于深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精通一二，略有发言权；但是，为了使该发言权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又必须尽可能扩大有限的范围，向更深广的领域渗透。

第二，在开放中确定互补互动的问题丛。每一个问题都是博大精深的系统，其所涵盖的次级问题及其所蕴涵的智慧是穷

毕生之力也难窥万一的，只能自觉地从深层的、前沿的、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及其开放而互补互动的问题丛中寻找切入点。^{〔1〕}

第三，寻求富于开放性和成长性、具有恒久性和普适性、不能被化约更不能被解构的问题核。我力图进入这样的阶段，从中展开个性化、建设性的研究。

之所以这样选择，起初是限于知识结构的褊狭，是被动的、不自觉的；后来则因认识的转变，而逐渐自觉起来。

惭愧的是，志向乃一回事，实践、效果却是另一回事；能否发现问题乃一回事，能否解答问题、解答的如何则为另一回事。限于知识结构的褊狭，我对所触所悟所思的问题解答得很不理想，有的甚至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有愧于自己，更有愧于读者诸君。敬请不吝指正，我会毅然前行。

张国钧

2008年1月

〔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6页。

目 录

我关注的“中国问题丛”(代序)	(1)
-----------------------	-----

结 构 篇

教育和人口再生产	(1)
教育和人口再生产的联系	(1)
教育和人口再生产联系的关键环节	(3)
教育和人口再生产的相互作用	(4)
中国农户经济:生命力及其佐证	(10)
中国农户经济 30 年来的发展	(11)
中国城市家庭经济的佐证	(16)
中国近代以来经验教训的佐证	(21)
回归家庭的世界性趋势的佐证	(23)

需要篇

当前利益追求的特点及其动力展开·····	(27)
真实·····	(27)
显明·····	(29)
多元·····	(31)
强大·····	(34)
个人利益简论·····	(38)
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	(39)
个人利益:利益的基本形式·····	(45)
个人利益“罪恶感”的恶果和历史成因·····	(53)
必然与困境:肯定个人利益和开放、改革、 现代化建设·····	(59)
企业活力的两个方面·····	(61)
利益追求:企业活力的主体源泉·····	(61)
利益导向:企业活力的制度保障·····	(64)
从全球化进程看互利·····	(67)
互利:从悠久的历史主题到崭新的时代精神·····	(67)
互利: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智慧·····	(74)
互利: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当代贡献·····	(80)

利益和赏罚的互补互动·····	(85)
借鉴和经验·····	(86)
赏罚是兴利除弊的机制·····	(90)
利益:赏罚的目的和动力·····	(94)
利益和赏罚良性互动的基本原则·····	(97)
邓小平的中国战略利益论·····	(102)
中国战略利益神圣不可侵犯·····	(102)
战略目标:富民强国·····	(106)
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和平统一祖国·····	(109)
守法:利益的外驱、良心的内生及其统一·····	(116)
利益:守法的外来的驱动·····	(117)
良心:守法的内生的支持·····	(123)
守法:利益的外驱、良心的内生两方面的统一·····	(127)

产 业 篇

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前景·····	(130)
文化产业正在蓬勃兴起·····	(131)
文化产业:21世纪的朝阳产业·····	(135)